

职业教育国际化平台的构建路径

任君庆



11月27日，由商务部主办，宁波职业技术学院承办的“2019年贝宁职业技术教育海外培训班”开班仪式在贝宁中国援建阿卡萨多职校举行。(资料图)

一、搭建职业教育国际化平台意义重大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职业教育国际化已成为一种必然趋势。我国的职业教育国际化起步于学习和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与模式，并在此基础上探索适应本土发展需求的路径。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我国职业教育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职业教育的国际化将从“引进来”为主向“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转变，职业院校的国际化将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

《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对我国职业教育国际化提出了新的要求，具有中国特色、国际先进水平的“标准建设”将成为今后我国职业教育国际化的重要内容。《教育现代化2035》强调指出，要“促进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特色发展”“鼓励有条件的职业院校在海外建设‘鲁班工坊’”等，为职业教育国际化平台构建营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因此，在推进中国职业教育标准体系的国际化过程中，既需要搭建新的国际化平台，创新国际化的发展形式，从而更好地服务中国企业“走出去”，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培养培训技术技能人才，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发展；又要发挥现有平台在推进中国职业教育标准体系走向国际化过程中的作用。

二、搭建职业教育国际化平台的特性体现

首先要体现职教特性。国际化平台的构建要充分对接我国职业教育的基本要素、遵循职业教育的内在规律、发挥职业教育的功能，通过平台搭建促进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

其次要体现合作性。构建职业教育国际化平台，要注重协调优化各方资源配置，开展形式多样的交流活动，搜集教育发展、产业需求等国际资讯，搭建国际化人才培养基地，提供跨境职业教育技术服务等等，以增进各利益相关方的交流与合作。

再次要强化服务性。在“一

带一路”倡议下，大批中资企业赴境外开拓国际市场，但由于受到当地人力资源素质和技能不高等因素制约，给企业发展造成了困难。因此，要发挥职业教育国际化平台的服务功能，集聚学校和企业的优势资源开展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技术服务等，培养培训中资企业境外发展所需的本土化人才，服务中资企业境外发展需求。

三、搭建职业教育国际化平台的路径选择

一是要拓展现有国际化平台的功能，发挥民间组织在推进职业教育国际化中的作用。如宁波职业技术学院组建的“一带一路”产教协同联盟，就需要进一步发挥平台在汇聚资源、信息沟通等方面的作用，促进职业院校的国际化发展；同时，要拓展孔子学院等境外办学机构的作用，助力职业教育“走出去”，针对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劳动力素质不高、技能水平低的现实，孔子学院在原有功能的基础上，可以与职业院校联手开展技能培训，提升当地劳动力水平。

二是要借助地缘和区域优势，打造区域性职业教育国际化平台。职业院校可以发挥地缘优势，拓展国际化办学领域。如云南德宏职业学院利用地处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重要节点的区位优势，与缅甸—中国友好学会青年会、曼德勒医科大学等机构合作，招收缅甸籍留学生365名；可以利用区域优势，发挥如“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宁波—中东欧论坛”等区域性国际交流平台的作用。要积极搭建校企合作平台，提升国际化办学质量。校企合作是当前职业教育国际化最为普遍的形式，合作层次涵盖中高职院校，类型包括“引进来”和“走出去”。一批职业院校积极探索开展境外办学，宁波职业技术学院与贝宁CERCO学院合作在当地招收计算机专业的全日制学生，采取“2+1”的培养模式，颁发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和CERCO学院双文凭。随着中国职业教育国际化进程的加快，职业院校与境外学校的合作项目将越来越多，需要深入研究校企合作平

台的功能和定位，提升合作水平。

三是要搭建校企协同平台，伴随企业“走出去”。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越来越多的中资企业在境外开展业务，亟须大量熟悉国际规则和企业所在国当地文化的技术技能人才。职业院校要积极与企业协同搭建“走出去”平台，在服务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提升自身的国际化办学水平。

职业院校要协同“走出去”企业搭建员工培训平台。广西柳州城市职业学院与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针对印尼生产基地开展人才培养合作。一方面，通过招收印尼学生到柳州学习，成立“中印(SGMW)汽车学院”，为企业在印尼的生产基地及相关产业园区培养和输送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同时，与印尼中等职业学校合作办学，成立“印中(SGMW)汽车学校”，为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印尼生产基地培训一线技术型工人。

职业院校要协同“走出去”企业搭建技术服务平台。陕西西安航空职业技术学院将服务航空产业发展、培养具有航空特色的创新型人才作为学院的建设方向，积极参与与中国航空技术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与加蓬共和国合作的中航国际加蓬职教项目，帮助加方建立职业院校，学院担任中航国际加蓬职教项目唯一指定咨询机构，组织教师和技术骨干为加蓬共和国完成了相关航空院校专业筹建方案书、专业教学方案、航空维修工程实训室建设方案以及加蓬高校航空维修工程实训中心建设师资培训计划，直接参与加方航空维修专业实训室的建设工作，并承担中航国际加蓬职教项目的师资培训工作。

职业院校要协同企业组建标准研发组织，共同开发境外培训的标准、课程和教材等，推进标准建设的国际化。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与德国五大汽车厂商共同制订了汽车机电维修专业教学大纲、考核标准、评估标准等。这些标准不仅在国内项目实施的院校中使用，而且也被德国汽车厂商等机构，用于其他国家的职业教育或职业培训。

(作者为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研究员)

高职教育“走出去”的类型分析

王琪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高职教育“走出去”的项目越来越多、范围越来越广，取得了初步成效。高职教育“走出去”实践涉及政府、院校、企业等多个主体，而在不同实践项目中，政府、院校和企业所处的地位、发挥的作用各不相同。根据项目发起和牵头主体不同，可以将“走出去”实践分为政府统筹推进型、企业需求驱动型和院校自主探索型三种主要类型。

前往赞比亚开展实践教学，为谦比希铜冶炼有限公司和谦比希湿法冶炼公司等企业开展仪表工、液压钳工、电工、焊工等员工技能培训。教育部办公厅作为政府部门专门印发了《关于公布有色金属行业职业教育“走出去”首批试点项目学校的通知》，明确相关项目学校，将我国相关政策保障。8所试点院校根据自身办学力量和特色，提供相应的课程研发、员工培训和技术服务。

3、院校自主探索型

院校自主探索型主要是指高职院校作为办学主体，与国外院校、机构等合作，通过境外办学、提供技术与人力培训、招收留学生、开发国际认可的行业或专业教学标准等形式，将我国高职教育办学模式、行业标准、课程教学理念等向合作国家推介的“走出去”活动。

1、政府统筹推进型

政府统筹推进型主要是指政府部门基于国家发展战略，作为主体直接承接高职教育合作与交流、对外援助等项目，统筹协调高职院校实施，并提供经费和政策保障，指导、监督、评估和考核项目完成情况的“走出去”活动。具体包括推进院校海外办学、组织院校开展对外援助与培训、国际交流互动等多种形式。如由天津市教委统筹高职院校和企业自主探索型项目中，院校作为牵头方自主开展“走出去”活动。政府作为政策制订者提供基本的政策保障和行政规范管理。企业作为合作方，根据院校设计的方案参与项目的实施。如宁波职业技术学院与贝宁CERCO学院共建“中非(贝宁)职业技术教育学校”，开设电子技术应用、摩托车维修和小型发电机维修、建筑设计与施工等与当地产业发展和民生需求紧密相关的课程，培训各类技能人才。

在政府统筹推进型项目中，政府占据主导地位，承担着项目的顶层设计、资助、推进、评估等职能。院校和企业作为项目的具体执行者，在顶层设计的框架下，根据要求实施项目。如鲁班工坊由天津市教委直接推动，天津渤海职业技术学院、天津启诚伟业科技有限公司等院校和企业通过开发教学项目、委派骨干教师、提供实习实训设备和技术支撑等方式参与项目的实施。

2、企业需求驱动型

企业需求驱动型主要是指企业提出海外发展的人才培养培训、技术研发和管理咨询等需求，高职院校围绕企业需求积极提供相应服务的“走出去”活动。具体形式主要包括高职院校依托企业平台在境外建立实训基地、为境外企业开展人才培养培训、提供技术指导和管理咨询服务等。满足企业海外发展需求是该类型“走出去”活动的突出特征。

在企业需求驱动型项目中，“走出去”企业占据主导地位，项目是由企业根据自身发展需要提出的，并由企业提供运行支持。院校根据企业需求提供师资、课程、技术服务等。政府发挥宏观管理者的作用，为项目的运行提供政策支持和保障。如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协同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吉林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等8所高职院校派遣教师

政府、院校、企业等多个主体共同推动了高职教育“走出去”实践的发展。政府统筹推进型“走出去”直接对接国家战略，充分整合资源，但难以大面积推广；企业需求驱动型“走出去”具备产教协同优势，发展动力较强，但协同机制尚未健全；院校自主探索型“走出去”涉及院校范围最广，灵活性较强，但能力建设亟待加强。

当前需要进一步完善协同机制，提升高职教育“走出去”水平。首先，要厘清高职教育“走出去”实践中政府、院校、企业分工合作的协同关系。其次，要完善高职教育“走出去”权责对等、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激励机制，为“走出去”实践提供完善的制度保障。再次，要搭建高职教育“走出去”资源互补、信息互通的交流平台，有效整合政府、院校和企业的资源，提升“走出去”能力。

(作者为宁波职业技术学院高教研究所所长、副研究员)



资料图

高职教育“走出去”的推进策略

张菊霞

高职教育“走出去”是高职教育扩大开放领域，从“引进来”向“引进来”+“走出去”双向开放纵深发展的一种形式，也是我国高职教育面向世界的有效载体，是职业教育国际化进程的加速器，是企业成功“走出去”的助推器，是促进民心相通的桥梁和孵化器。

当前，我国高职院校“走出去”处于起步阶段，牵头主体以院校立足办学优势自主探索为主，“走出去”实践形式以合作办学、招收留学生、短期培训及传统文化交流为主，“走出去”区域集中于俄罗斯、南亚、东盟及非洲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走出去”专业以第三产业为主，“走出去”的高职院校集中于境内沿线省份及示范(骨干)院校。面对国内企业“走出去”势头强、人力资源需求大，“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发

展与人口就业匹配度低、部分国家教育不发达与人口受教育程度低的外部需求，高职教育“走出去”需多方联动、对接需求、境外办学，加强“走出去”。

1、多方联动，建立校企协同“走出去”机制

政府、院校及企业要多方联动，探索建立校企协同“走出去”机制，为高职院校与企业协同“走出去”保驾护航。

首先，建立校企协同政策保障机制。政府通过出台校企合作“走出去”的指导政策和管理办法，明确校企双方在“走出去”过程中的功能定位与角色任务，确保权利分明，积极健全境外办学制度与资产管理制，为企业与院校协同“走出去”提供制度保障。其次，建立校企信息共享机制。搭建校企双方协同“走出去”的信息交互平

台，通过发布或更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相关政策法规、行业动态、企业人才需求、教育现状等内容，并积极开展跨境的多渠道线下校企实体对接活动，以探索更加多样的校企合作发展空间。再次，建立校企协同工作机制。加强校企相关部门协同工作机制建设，通过国家“一带一路”办公室统筹协调境内外各相关行业企业，促进高职教育与企业协同“走出去”的常态化与持久性。

2、对接需求，院校推进专业精准“走出去”

高职院校要紧密对接境外需求，推进专业精准“走出去”，服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力资源水平的提升。

首先，不断加强“走出去”自身能力建设。牢牢把握制定并输出专业标准这一关键，积极组织国际

专家、国内专业领域专家及职业教育专家等制定专业标准，为“走出去”长效机制奠定基础；加强师资培养政策与中长期规划，为教师“走出去”提供激励措施和保障条件。其次，充分调研，提高专业对接精准度。院校应厘清思路，在“走出去”前充分调研对象国的产业与人才培养现状和需求，避免盲目性与随意性。第三，特色鲜明的产类高职院校，在拓展国内社会服务功能的同时，积极探索“走出去”，服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一方面为沿线国家培养农业类人才，帮助其改善产业与人才就业的结构性问题，另一方面也开展“国际化+农业”双轮驱动的发展模式，改善当前农业类院校发展的社会困境。

3、境外办学，横向拓展与纵深发展“走出去”

境外办学是输出高职经验与模

式最有效的方式之一，可以更加直接地将我国高职教育模式与经验输出，助推对象国职业教育发展与人力资源提升。

首先，扩大境外办学规模，促进“走出去”横向拓展。我国内地省份优质高职院校要通过与东南沿海省份高职院校联合等形式积极探索“走出去”境外办学，促进国内高职院校在省域分布上趋于基本平衡。其次，因地制宜开展境外办学，促进“走出去”纵深发展。境外办学需“走得稳”与“留得住”，高职院校境外办学要遵循适应性、有效性、融合性原则，因地制宜、入乡随

俗，深入了解境外文化和经济社会发展环境，准确境外办学定位，并开设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相适应的专业，提高适应性。再次，保障境外办学质量。积极组织或者委托第三方对境外办学有效性；教育主管部门积极加强对境外办学学历学位的认证，促进境外办学的融合性。

(作者为宁波职业技术学院高教研究所副研究员)

【本文为市社会科学研究基地课题“‘一带一路’试验区建设与宁波—东盟职业教育合作研究”(编号:JD19YDZJ-3)成果】